

水到渠成：略论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建立

刘强 姜涛

【提要】由于19~20世纪之交清政府统治的日渐腐朽和民心的日渐丧失，迫使一部分人士起来大声疾呼推翻无可救药的清政府统治，并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与此同时，革命派分子要求革命势力走向统一的呼声也日趋强烈。当清政府赖以自救的新政政策和对国内革命派人士的高压政策客观上造成了中国革命势力在日本东京的大量聚集时，孙中山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其他革命派骨干促成了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在东京的成立。

【关键词】清末政局 同盟会 留日学生 孙中山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1-0124-05

1905年8月，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以下简称“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的成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其历史意义不待多言。其现实意义，不仅在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达到了整合当时在日本活动的民主革命团体的目的，以及孙中山所大力宣扬的民主革命思想得以成为令大多数盟员信服的革命纲领，同时在于所成立的总部基地还处于距离中国如此之近的日本东京，并且正式把数量众多的留学生“开发”为民主革命队伍的主力。同盟会的成立，为苦苦求索的革命党人带来了新的希望，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孙中山对同盟会的成立更是予以了高度评价，他在日后追忆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①

一、中国当时政局的发展和朝廷被国人厌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几次交手中感觉到，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是不可轻言动武的。当然，日本没有被列入上述国家名单，因为在中国人眼中，日本自古以来就处处以中国为师，不足为惧。但令国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得大败，还被迫签订了空前惨痛的《马关条约》。条约签订后，全国哗然。然而，绝大多数民众并没有将因政府的腐朽无能而导致中国惨败作为主要原因去责难朝廷，反而是热切地向朝廷呼吁“拒和”、“迁都”、“变法”，希望朝廷振作起来。1895年康有为领衔发起、有1300余名各省应试举人参加的“公车上书”事件便是明证。当时，虽然民主革命党人认为朝廷的腐朽已无药可救，并试图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它，但并没有为广大百姓所支持或接受。据孙中山在日后回忆1895年革命党人发起的广州起义时写道：“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②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7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5页。

1900 年，清政府企图借义和团之力对抗八国联军入侵，其结果却是不仅联军没有被阻挡住，反而皇太后、皇帝及朝廷被赶出北京，惶惶然逃窜西安。之后，朝廷不但转过头来伙同侵略者屠杀义和团，而且还与侵略者签订了比《马关条约》更为耻辱的《辛丑条约》。只是慑于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无畏斗争精神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清政府已经彻底被洋人打怕而成为“洋人的朝廷”，^①才使得中国避免了被瓜分的厄运。国家背负的奇耻大辱和巨额赔款并没有使皇室、贵族的生活质量下降，因为满洲贵族利益的总代表慈禧太后依然揽着大权，而还款压力也被转嫁到了普通百姓头上（赔款资金来自于盐税和海关税）。慈禧太后对帝国主义没有把她作为祸首惩办而感激涕零，并厚颜无耻地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②朝廷镇压民众反抗的凶残与被侵略者驱赶奔逃的凄惨形成了鲜明对比。自此之后，朝廷在全国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受到严重打击，不少人开始质疑朝廷统治的可拥护性，并逐渐接受革命思想和革命行为。据孙中山日后回忆革命党人在 1900 年惠州起义时写道：“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指 1895 年广州起义）有别矣。……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也。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③到 1903 年时，邹容撰写的《革命军》能够得以“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万册”，^④已经说明民众对于朝廷的不满程度和赞成革命的人数已经大大增加。

1903 年 4 月，俄国拒绝履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中的部分义务，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条件，企图把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变成其独占的势力范围。消息传开，国人群情激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拒俄风潮。但是，清政府不但不对此予以支持，反而还以“防范革命”的名义对拒俄运动进行镇压。清政府时任驻日公使蔡钧诬告东京留学生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于是，清政府密谕各省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问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⑤

反帝爱国的拒俄运动遭遇到清政府高压政策，促使更多的新型知识分子从爱国走向革命的道路。“我以热血待人，其如人冷遇我何！”“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满洲者惧矣……呜呼！革命其可免乎！”^⑥朝廷对主权丧失时的无能反应、镇压民众反抗时的残酷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步步升级，与此同时，朝廷民心的丧失也在一步步加剧。

二、全国革命队伍的扩大和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189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牵头成立的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组织，成立时仅有二十余名会员，至当年年底时也仅为 129 人，且多为当地有业华侨，不愿舍业。^⑦“1900 年 4 月 29 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称：‘前孙中山在此之时，创一兵会，习者数十。然人皆有业，罕暇晷，不能大成，久而遂懈。’”^⑧此后至 19 世纪结束，在中国本土范围内并没有发现有第二个类似的民主革命团体产生的文献记载。

但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由于广大百姓对清政府统治现状的日益不满，因此，在一部分民众逐渐接受立宪思想的时候，也有一些民众逐渐接受革命思想。革命书籍、报纸、杂志的发行量越来越大，宣传、鼓吹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⑨据统计，1905 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刊行的革命宣传材料中，书籍约 80 种，报纸约 20 种，杂志约 24 种。^⑩主要革命材料出版地有上海、东京、松江、芜湖、金华、广州、长沙、杭州、厦门、香港、檀香山、旧金山、曼谷、新加坡等地，^⑪许多宣传材料有着广阔的发行市场。例如，上海出版的《警钟日报》在苏州、台州、杭州、绍兴、武昌、长沙、成都、汉口、南昌、济南、安庆、镇江、宁波、无锡、常熟、九江、南

① 陈天华：《警世钟》，《辛亥革命》第 2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5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26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82 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235 页。

④ 冯自由：《〈革命军〉作者邹容》，转引自张海鹏、李细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 5 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1 页。

⑤ 《密谕严拿留学生》，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76、265~266 页。

⑥ 季子（陈去病）：《革命其可免乎》，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 293 页。

⑦ 钟工宇：《我的老友孙逸仙先生》，《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⑧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2~233 页。

⑨ 关于国内革命思想萌芽、发展、传播的脉络，本文对此不作重点阐述。

⑩⑪ 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革命逸史》第 3 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36~156 页。

京、香港等18个地方设有23个分售处,^①有些材料销售量也相当可观,据1904年《警钟日报》一份关于武汉地区各报刊销售量调查资料,其中《警钟日报》300份,《政艺通报》70份,《浙江潮》40份,《江苏》30份,《汉声》20份,《中国白话报》80份,《安徽俗话报》20份。^②

民主革命宣传材料的广泛流传,自然引起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观念的深入人心。因此,众多的民主革命团体也在1900年后迅速地建立起来。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11年间,国内外共成立了66个革命团体,其中1902年以前17个,1903年20个,1904年20个,1905年9个;按区域划分,国内45个,国外21个(其中日本19个)。^③

在此段出现的民主革命团体当中,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成立年份的频率阶段性特征明显,以1902年为界,前段疏,后段密。1895年~1902年的8年间,全国一共成立了17个民主革命团体,年均成立2.13个;而从1903年~1905年的3年间,全国成立了49个民主革命团体,年均16.33个,为前者的近8倍。

地域分布的空间布局不平衡,长江中下游流域城市、华南及日本分布密集,有58个;东北、华北、西北及西南分布稀疏,共只有8个。^④这说明,越是远离清政府统治重心、同时越是工商业发达或者越便于接触国外思想的地方,分布越密集;反之亦然。

在成立的民主革命团体当中,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最为著名。从史料记载中不难看出,当时主要的民主革命团体的成立、活动主要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1.其领导人均在海外或国内思想较为开放的地方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2.其活动地域基本以一省为限,最多到与本省临近的另一省;3.其动员的主要革命力量,除科学补习所外,主要是当地会党分子。

虽然民主革命团体的数量在不断增多,但是由于清政府在国内的严密控制,民主革命分子在国内的生存空间是很小的,能够串联的机会也并不多。孙中山在1894年底到1905年间基本上不在国内,就跟上述原因有莫大关系。因此,上述民主革命团体的骨干分子在成立革命团体之后纷纷被迫出国,在国外发展革命力量。其中一部分人到了西欧,大部分人东渡到了日本。因此,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当时的骨干分子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时功玖、曹亚伯、田桐、冯自由、汪精卫、胡毅生、朱执信、马君武、邓家彦、程家桎、吴春阳、蒋尊簋等人,都是国内各民主革命团体的骨干

三、时局及清政府政策的影响 使大批寻求新知的留学生 聚集在日本

19世纪末,在刚受重创的维新党人与正在成长的革命派人士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时候,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也在疾呼:“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⑤在经历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太后也深知自己与大清王朝的命运只有在新政变法的旗号下才能苟延残喘,于是在无奈中动了改弦更张的念头。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尚在西安的朝廷发布了第一道新政改革上谕。在此后朝廷陆续展开的新政措施中,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举措使清政府无心插柳成荫,造就了一大批渴望接受新知、革故鼎新的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当中的许多人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之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是很少的。孙中山在1903年9月前多次到日本从事革命活动,都没有组织起大规模的留学生革命团体,虽然可以将当时在日的梁启超等保皇派的主张影响了一部分留学生的思想作为影响因素,^⑥但当时的在日中国留学生总数也实在是有限,具体数据见下页表1所示。

日本与我国邻近,种族、语言、风俗等文化背景相近。明治维新以后,昔日被中国视为“学生”的日本一跃而起,竟然成为与欧美列强并列的强国,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深思和重视。早在1898年时,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指出:“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⑦于是,从1901年起清末新政鼓励赴日留学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日本去留

①② 转引自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5卷,第161页。

③ 参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2),1982年,第663页。

④ 参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663页。

⑤ 张之洞:《致西安鹿尚书》,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总第8527页。

⑥ 革命党与保皇党在全球范围内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在努力争取资源和信徒,具体争夺情况本文不作重点阐述。

⑦ 张之洞著,赵德馨主编《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总第9738

学，并在 1905 年之前呈现迅速增长的势头，具体情况见下表。^①

表 1 1901 年~1905 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统计

年份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人数	266	727	1058	2406	8000

下面我们单独分析 1904 年赴日本的留学生省籍来源统计表，具体情况框见表 2。^②

表 2 1904 年中国留日学生的省籍来源统计

全国统计	湖南	湖北	四川	江苏	浙江
2406	363	341	321	280	191
广东	直隶	云南	安徽	福建	江西
175	172	126	84	76	52

表 2 中所显示的省份为 1905 年前在本省存在革命团体的省份，共 11 个。而这 11 个省份中于 1904 年赴日的留学生总数为 2181 人，占当年全国总数的 90.6%。那我们是否可以确定，某省的赴日留学生人数是否与该省的革命团体活动情况和革命思想传播情况呈正相关关系呢？事实上，早在 1901 年，赴日留学生就成立倾向革命的团体，创办了倾向革命的报刊；^③ 1902 年底，成立了日本留学界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④ 到 1905 年时，在日本已成立了 19 个革命团体。可以看出，在日留学生的革命组织发展状况是可观的。

1905 年 1 月 1 日，驻守旅顺的俄军向日军投降，君主独裁的欧洲大国俄罗斯败在了君主立宪的亚洲小国日本的手下，令世界震惊。随即，2 月 14 日，俄罗斯又爆发了连锁反应式的一系列革命和暴动，沉重打击了君主专制制度。鉴于 1905 年到日本留学的人数与 1904 年相比有井喷式的增长，再考虑到清政府于当年 9 月份才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因此，可以断定，日俄战争的结果及俄国 1905 年革命对中国全国知识群体中关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的认识是有较大程度启迪的，这也在更大程度上促成了这部分群体进一步流向日本，寻求新知，拯救中国。

清政府的新政政策及时局的影响造成了大量留学生在日本的聚集，而这当中又有许多留学生在这里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革命派分子；在这些革命派分子结束留学回国后，又开始在国内进行革命思想传播；而当清政府对待革命派力量采取高压政策迫使国内活动的革命派分子流亡国外后，大部分人又来到了离中国最近、革命力量最集中、相对政治环境最宽松的日本。在这样的反复

过程中，革命思想进一步得以宣传、交流，非常有利于革命联盟的组成。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留日学生越来越认识到组建全国性政党的必要性。例如 1903 年第 3 期的《浙江潮》就发表《非省界》一文，倡议集合各省“非常奇杰之士”，组成一个类似“泰西文明国大政党”的“中国本部统一会”。^⑤ 但是很显然，这个结果的出现必然需要若干位具有较高威望、较强组织能力和较强战略眼光的革命者来牵头、推动，以及须得有适合大规模革命组织开展的场所条件。历史的进程显示，孙中山当之无愧地担当了牵头者的角色，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担当了推动者的角色。当上述人员适时地在革命力量集中的日本东京出现时，预示着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很有可能要发生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

可以说，到了 1905 年时，从革命思想宣传的覆盖面、全国民众对革命思想的认可度、革命团体数量及革命党人希望联合的主观意愿来讲，已经具备了统一的革命团体大联盟的条件。而当孙中山这位在海内外均影响巨大的民主革命领袖认识到这些情况之后，马上敏锐地抓住了时机，开始了革命资源的整合和革命队伍的扩充，并获得了成功。

四、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人对于时局的把握和促进

庚子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即有意号召各省同志组织革命大集团”。但有鉴于孙中山是全国知名的通缉犯，因此孙中山不能轻易冒险到大陆。^⑥ 1904 年 4 月 22 日，“西太后为庆祝七十寿辰颁布懿旨，内称：‘因思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免其既往，予以自新。’”^⑦ 因此，孙中山一直把最主要精力放在在海外寻求革命资源和促进革命大联盟的建立上，以及努力寻求能够忠实贯彻其革命思想的核心依靠力量。在 1905 年之前的革命活动中，孙中山主要在会党分子、华侨中间宣传其革命理念，并把会党作为其发动革命运动的主力。但是事实证明，会党

^{①②③④} 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 5 卷，第 119、120、133、134 页。

^⑤ 参见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34 页。

^⑥ 从 1895 年起，朝廷就开始在全球通缉孙中山，直到 1904 年，情况仍未有所改变。

^⑦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 5 册，中华书局 1958 年版，总第 5191 页。

的表现不令孙中山满意。^①

当孙中山了解到当时日本聚集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和认识到留学生可作为革命队伍的生力军时，立即把握时机，参与到革命大联盟的促成中来。

在结束了欧洲的活动后，孙中山于1905年6月11日从法国东返，并于7月初抵达新加坡海域，约见了新加坡革命志士陈楚楠等人。孙中山在路过西贡时，在致陈楚楠的函中写道：“不停西贡，直往日本，先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今日时机已熟，若再不发，恐时不我待，则千古一时之会恐不再来也。”^②

事实上，在日本的革命派人士也是非常期盼着孙中山赴日来整合革命队伍的。据载，1904年底东渡到日本的黄兴、宋教仁等“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中坚”。而程家桧则“力阻之”，并谓“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足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③因此，组建革命政党已经水到渠成。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横滨。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后，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得以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联盟首次正式形成。当时与会代表在讨论革命同盟的名称时，初步议定为“中国革命同盟会”，这与当时民主革命者对该组织的定位是相同的。只是为了后来在组织斗争过程中的便利，才去掉了“革命”二字，但这并不影响该组织民主革命政党的性质。

此次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当时国内主要的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的骨干分子均参加了进来，使全国主要革命力量得以整合，革命声势颇为扩大，真正起到了之前各革命团体单打独斗所起

不到的作用。之后，无论是与清政府的斗争，还是与君主立宪派在思想上的争锋，民主革命派都显示出了比中国同盟会成立前更强的气势和更高的智慧。后来，在同盟会与清政府的斗争中，虽有共进会的成立、光复会的重建以及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等事件发生，但始终不能改变同盟会是民主革命同盟的事实。

综上所述，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统治的日渐腐朽和民心的日渐丧失，迫使一部分人士起来大声疾呼推翻无可救药的清政府统治，并且这种呼声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而革命派人士要求革命势力走向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当清政府赖以自救的新政策和对国内革命派人士的高压政策客观上造成了中国革命势力（含以留学生为代表的潜在革命势力）在日本东京的大量聚集时，孙中山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其他革命派骨干促成了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在东京的成立。

本文作者：刘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2009级博士研究生；姜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俊

① 关于记载孙中山对会党的认识和评价的文献资料很多，本文在此不作重点叙述。

②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5页。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页。

Success Will Come When Conditions are Ripe

—On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Alliance in 1905

Liu Qiang Jiang Tao

Abstract: As the rule of Qing government at the turn of the 19—20 century is subject to increasing corruption and the gradual loss of popular support, some people come forward and speak out to overthrow Qing government's hopeless rule, which gains more and more people's support. At the same time, revolutionary forces are called on to develop into a unified one. When Qing government's New Deal policies and the domestic high pressure policy against the revolutionary people subjectively lead to a large gathering of revolutionary forces in Tokyo, Japan, Sun Zhongshan considers the situation, makes a prompt decision, seizes this rare opportunity, and establishes the Chinese Alliance with other revolutionary backbones in 1905 in Tokyo.

Key words: Late Qing political situation; Chinese Allianc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Sun Zhongshan